

◎文学聚焦

历史小说：历史真实与艺术想象

王春林

大凡文学题材，从总的角度来看，约略不过两类：一类明显指向当下时代的现实生活，具有强烈的现场感，另一类则指向已逝的既往历史生活，有着不容忽视的历史感。人类的生存，虽然总是会以现实生活的方式直接呈现，但却都是从遥远的历史长河不断奔涌续续而来。因是之故，在当下时代的中国文坛，现实与历史两大类题材的小说创作，可以说是平分秋色各有擅长。

或许与文体特性的不同有关，相比较而言，中短篇小说作家会把更多的关注视野投向现实题材，而长篇小说作家，尽管不能说不关注现实生活，但却会把更多的目光聚焦到历史题材上面。更遥远的既往岁月且不说，单只是近些年来，在长篇小说领域，便出现了一大批优秀之作，吴亮的《朝霞》、张炜的《独药师》、吕新的《掩面》与《下弦月》、刘庆的《唇典》、何顿的《黄埔四期》、张翎的《劳燕》、袁劲梅的《疯狂的榛子》、李凤群《大风》、陶纯的《浪漫沧桑》、严歌苓的《芳华》、范稳的《重庆之眼》等，均各具特色，皆可谓一时之选。

历史小说有两种面对历史方式

历史小说会有两种面对历史的不同方式。一种方式是，尽管在内容上是对某段历史真实的描写和表现，但所有的人物、所有的事件却全部都是虚构出来的，比如像莫言的《生死疲劳》《丰乳肥臀》，贾平凹的《老生》，王安忆的《天香》，包括我们在前面罗列出的绝大部分作品，这些长篇小说虽然关注表现着真实的历史生活，但他们笔下的那些人物和故事却是虚构出来的，属于一种拥有“天马行空”式的想象自由的小说创作；另外一种历史小说，除了要面对真实的历史史实，还要面对一群真实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要更进一步地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相应的艺术加工、虚构和想象，二月河曾经名噪一时的《雍正皇帝》《乾隆皇帝》《康熙大帝》、唐浩明的《张之洞》《曾国藩》《杨度》，李骏虎一部表现红军东征的《共赴国难》，都是如



此。这一类历史小说，与前面提到的莫言、贾平凹他们那一类历史小说，从写作方式，到基本的艺术思维方式，都有很大不同。毫无疑问，后一类历史小说，有着更大的写作难度。某种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用“多关于现代格律诗创作的那句‘带着镣铐跳舞’来看待评价这一类型的历史小说创作。这里，能够充分考验作家艺术功力的一点是，作品意欲表现的那段历史故事与历史人物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所以，想要在充分尊重历史事实的前提下使自己的小说写得精彩，便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人性真实是历史小说的文学性所在

不管是哪一类历史小说，恐怕都需要充分地顾及这三个方面的要素。其一，是史实，也即历史现场的真实还原。既然号称历史小说，那首先就须得有对于基本史实的必要尊重，无论如何都不能在基本的史实问题上闹出诸如关公战秦琼之类的笑话来。其二，是史识，或者也可以被表述为历史观。所谓“历史观”，亦即作家对自己所表现的那个历史时段所持有的基本思想认识立

场。比如《三国演义》的历史观，就是家国叙事和道德叙事紧紧缠绕在一起的。整部《三国演义》的叙事过程中，作者那样一种“尊刘贬曹”精神价值立场的存在是极其鲜明的。虽然在一部优秀的历史小说中，作家的思想倾向也即历史观必须巧妙地潜藏在文本的字里行间，但无论如何，我们无法想象一部缺乏历史观的优秀历史小说究竟会是怎样一种模样。其三，更重要的，还应该是作家的艺术想象。之所以这么说，关键原因还在于，在已经拥有了以求真为根本追求的历史学科的前提之下，还要存在所谓的历史小说，就很显然意味着广大社会受众并不仅仅满足于教科书式的对历史的表达与理解，而更期待能够借助于小说的艺术方式对貌似僵硬的历史作一种审美与人性的打量与观照。对于这一点，批评家王彬彬曾经借助于对京剧《曹操与杨修》的谈论发表过很好的意见：“《曹操与杨修》问世后，好评如潮，许多论者都从人性的局限、性格的悲剧这一角度解释了该剧感人的原因。并非是为了歌颂或批判什么人，也不是要图解某种政治理念，只是通过曹操与杨修的冲突，探讨和揭示人性的种种表现，的确是该剧成功的关键。”由此可见，广大读者之所以在史学之外，仍

然对于历史小说有强烈的阅读渴求，关键原因就在于此类小说作品可以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更能提供给读者一种人性的真实世界。从这个角度来看，王彬彬所谓“人性的真实”，正是历史小说的文学性所在，也是作家的艺术想象能力的真正用武之地。

以这样三方面的标准衡量评价当下时代的历史小说，便不难发现其中的一些问题。比如有一部把故事背景设定为晚清时期的长篇历史小说，在叙事过程中，就出现过那个时代实在无法想象的超时代话语。比如：“世民只说了一句话：‘异化，这是异化。’家里的人，村里的人，都听不懂这句话，甚至也不想去问这句话的含义，因为这句话已经离他们太远。”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代，如同“异化”这样的语词，无论如何不可能出现在浙江东部一个偏僻的山乡里。不管作者或者其他人怎样地以所谓的魔幻色彩为这部小说辩护，在我看来，这样的一种超时代话语的突兀出现，的确在很大程度上违背了“史实”的原则。如此一部长篇小说，因此也就谈不上建立在“史实”之上的“史识”与“艺术想象”了。

与这部失实的小说相比较，其他那些成功的长篇历史小说，就可以在以上三方面都有着堪称出色的表现。这方面的一个突出例证，就是刘庆那部旨在透视表现东北近现代史的《唇典》。在尽可能还原历史史实的前提下，刘庆更是设定了第一人叙述者“我”也即满斗这样一个萨满形象作为切入表现对象的叙述视角，并由此而引入一种带有鲜明东北民间色彩的世界观。与此同时，无论是对于郎鸟春这样一个类似于《静静的顿河》中的葛利高里那样的英雄形象，抑或还是那位为《唇典》提供了人道主义精神尺度的李良萨满形象的刻画塑造，也都格外突出地体现了作家刘庆一种非同寻常的艺术构型能力。这些思想艺术特点的准备，就使得《唇典》成为了一部近年来难得一见的优秀史诗性长篇小说。

(作者为山西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



宗璞

◎新作评介

大历史与自叙传

评宗璞的长篇小说《北归记》

孟繁华

《北归记》(《人民文学》2017年第12期)是著名作家宗璞多卷本长篇小说《野葫芦引》的压卷之作。前三卷《南渡记》《东藏记》《西征记》，发表之后在读者和批评界引起极大反响。其中第二卷《东藏记》获第六届茅盾文学奖。《北归记》的发表，使我们有幸看到了《野葫芦引》的全貌，有机会看到了一个知识分子书写的大历史和自叙传。应该说，包括《北归记》在内的《野葫芦引》四大卷，是当代文坛的重要收获。

我之所以说这部巨著写的是大历史，是因为在前三卷中，在风雨飘摇国将不国的时代，我们看到了知识分子与时代的密切关系。看到了为人正直慷慨，有一颗拳拳爱国之心的明伦大学教授孟樾，看到了学识渊博心系家国、宁死不做汉奸的吕清非，看到了用一死呼吁停止内战的将军严亮祖，看到了参军后壮烈牺牲的明伦大学学生澹台珩，当然还有地下党员卫蔚、远征军师长高明全、游击队长彭田力等。这些人物的中国波澜壮阔的现代历史有关，与中华民族仁人志士的家国情怀有关，是他们在国破家亡的时代，共同书写了一个民族浩歌般的抗争史和精神史。小说从北平沦陷，明伦大学南迁写起，然后是抗日军队长沙一战失败，明伦大学不得不再次西迁昆明；1944年，抗日军队克复腾冲，第二年抗战胜利；1946年，孟樾和家人返回北平。

《北归记》写的就是孟樾一家回到北平的生活。多年离乱，盼望的和平生活终于到来，离别北平多年的孟樾一家和明伦大学的教授们，心情可想而知。因此，明快风格是《北归记》的主调。战乱中成长起来的一代，尽情享受和平生活带来的欢乐。他们跳舞、滑冰、听音乐、读书、堆雪人、搞诗歌朗诵会、学术报告会等。小说充满了校园的青春气息。我们知道，作家书写什么表明的是作家关注什么。《北归记》中对日常生活的盎然兴致，表达的恰恰是作家对和平生活的向往和热爱。只有经历了这一切的人，对和平生活的来之不易才有更深刻的体会。而此时，爱情生活如带露的玫瑰，勃然绽放在年轻一代的心头。孩子与卫蔚、帽与无因、之薇与颖书、峨与家毅等，无论是热烈、温婉还是怪异，爱情既是他们的相互选择，同时也是对未来的选择。宗璞是书写青春爱情的圣手，当年的小说《红豆》曾传诵一时。北大曾有新生到颐和园寻找过江玫与齐虹当年定情处。《北归记》中对几对年轻人爱情的讲述，是小说最华彩的篇章。

抗战胜利后，内战接踵而来。因此，教授和青年学子们并不是尽情享受胜利后的和平生活。他们举办严亮祖将军座谈会，组织出版纪念严亮祖将军专辑。这些活动在先后影响到南京、昆明、重庆等地，停止内战的呼吁此起彼伏。反内战、反饥饿是《北归记》记述大历史的基本旋律。即便是在场景描述中，仍隐约透露出这样的痕迹：“随着五月的到来，校园里柳枝已经成荫，各类花朵依次开放，五月的鲜花十分绚烂。桥头的墙壁、大饭厅、各宿舍张贴了许多纪念五四的壁报，也有很多反饥饿、反内战的标语和文章。”尽管内战是知识分子不能阻止的，但他们一定要表达他们的良知和责任。教授和青年学子在表达时态度度的同时，当然也没有忘记自身的使命。对大学之道的坚守，是那时代知识分子最值得尊重的文化信念。当一个高级职业学校向教育部申请要将他们的学校设在明伦大学里的时候，主任教授说：“职业学校培养的是谋生的手段，这是社会和个人都需要的。大学培养的是独立的全面发展的人，而不只是技术手段”；孟樾说：“大学培养出来的人，应该有理想有热情，能够独立地自己判断是非，而不是被人驱使。我们培养的是人，不是工具。大学不只是教育结构，还是学术机构，它的人物是继往开来、传授知识并且创造知识。国家的命脉在于此。”大学教授们对大学功能的议论，显然不止是话语讲述的年代，它与讲述话语的年代同样有关。因此，宗璞在讲述个人经验的同时，她也在讲述历史。抗日战争爆发后，宗璞和全家随父亲冯友兰自北京南渡昆明，在西南联大度过了8年时光。亡国之痛、流离之苦、父辈师长的操守气节，给少年宗璞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这段生活对她而言弥足珍贵，既不可复制也难再经验，既是她丰富的创作素材，也是她灵感的一部分。她年过八旬之后，这段经历历历犹新，可见它对宗璞的重要。她不惜用几十年的时间来完成这一巨著的创作。因此，1989年，《野葫芦引》第一卷《南渡记》发表之后，卜之琳评价说：“就题材而论，这部小说填补了写民族解放战争即抗日战争小说中的一个重要空白；就艺术而论，在新时期小说创作的繁荣中独具特色，开出了一条小说真正创新的康庄大道的起点。”

另一方面，宗璞是重要的知识分子题材作家。特殊的家庭教养和她自己学贯中西的文化根底，使宗璞小说具有的文化内涵和艺术品质有极高的辨识度，无人可代替。大家闺秀的才情、气质在举手投足间，宗璞的才情气质则在遣词用语和人物的一招一式间。孙犁评价宗璞的文字时说：“明朗而有含蓄，流畅而有余韵。”我们发现，《北归记》对日常生活的讲述，多有“红楼梦”，“方壶”里外进出的人物以及对话方式，与《红楼梦》确有谱系关系。而小说蕴含的浑然天成的高雅气质，更是令人过目难忘。

◎作家谈

文化人应该关注社会

张陵

文化现在很重要，而且越来越重要。今天，我们把文化当作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看，就更重要，文化人理应大讲特讲。不过，文化说到底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历史、现实的反映，是经济社会现实生活方方面面发展变化的反映，是一个时代的意识形态。从这个层面看，还有比文化更重要的事情。文化人要把文化想好讲好，恐怕要注意到比文化更重要的事情。如果不是这样，那就会把文化看浅了、看薄了，文化的重要性反而凸显不出来。比如，对新时代的认识，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认识，光是从文化上去把握就不到位，需要文化人从社会主要矛盾表现最深刻的民生方面去认识把握才更准确深刻。民生就比文化更重要。文化人更需

要多想多讲经济社会、时代现实、百姓生活。在这个深厚的基础上，才能想好讲好文化上的事情，才能抓住文化的本质和方向。因此，社会越讲文化，越重视文化，文化人就更应该越讲社会，越重视社会。

其实，文化一旦热起来，就可能带着风险。相信许多人特别是商家对文化的热情如此高涨，不能排除看到文化巨大含金量的因素。文化成为产业是好事，但文化要是被资本绑架就是风险，不是好事。如果文化人不能保持清醒，不真正认识和把握文化的本质和方向，就会成为被绑架或参与绑架的文化人。

我说的文化人，更多的是指作家、艺术家。他们是社会原创文化产品的生产者，是文艺创新的主力军。一个作

家、艺术家看家本领再大，失去了社会生活这个资源，也实现不了原创创新。这是个常识。因此，要出好作品、大作品、与时代相称的作品，就要牢牢地认识和把握文艺的基本关系，也就是文艺与时代、文艺与生活、文艺与人民的关系。在这个关系里，有个基本的判断，那就是，文艺以社会存在作为自己存在的基础；文艺以社会价值作为自己价值的前提。因此，文艺是现实生活的反映。从中国现当代文艺发展历程看，任何时候，基本关系处理好，文艺就发展得顺利；基本关系处理不好，文艺发展就问题多困难大就不顺利。在这个关系里，作为作家艺术家的文化人要找对和摆正自己的位置，要讲文化，又不能光讲文化。



评论家张陵

有各种各样的文化，也会有各种各样的文化价值判断。比较直观的区别就是好文化坏文化，进而区分进步文化、先进文化、落后文化、腐朽文化。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必须要支持好文化，抵制坏文化；保护进步文化，发展先进文化，改造落后文化，打击腐朽文化。但对文化的好坏优劣的评判以及取向，在根本上也不依靠文化本身，而要依靠文化之外的时代现实、经济社会、人民生活。我们常说的：人民群众是文化最终审判者和受益者，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忘记了这个道理，文化就会失去方向、失去标准、失去品质、失去价值、失去意义。

马原小说《黄棠一家》回归现实

温尔

先锋派代表作家马原的长篇小说新作《黄棠一家》近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小说讲述中产阶级黄棠、洪锦江的家族故事，由此展开对多个社会阶层的描绘，堪称一部当代社会生活的“浮世绘”，反映了近几十年当下社会发生的变化。通过这一家族的叙事，体现作者对现实生活的理解和把握，也体现作者把握改革开放历史的努力。

评论家陈晓明认为，马原通过对生活的投入、寻找和思考，完成了创作转型，回归了现实。小说《黄棠一家》将当下社会的各个方面浓缩在一个家族里，反映了正在发生的、变化的现实，生活本身的平常性中包含着奇异性，小说中奇异性与日常性混合在一起。小说是对改革开放历史的见证和百科全书式

的展示，具有现实感、真实感。

马原说，自己生了一场大病后对生活的看法有所改变，自己离现实生活近了，离人群近了，更加关心当下。在这部《黄棠一家》中，马原开始直面当代社会的生活，以新贵族黄棠一家为基点，表达对于社会发展的深切关注。作者力图恢复传统现实主义反映现实的准确性和生动性，在“和解”与“距离”之间，找到属于自己的表述方式。



“甘肃儿童文学八骏”亮相童书展

日前，以刘虎、赵剑云、轩辕小胖、曹雪纯、刘梅花、张佳羽、刘海云和杨胡平等8位作家为阵容的“甘肃文学八骏”人才系列方阵“儿童文学八骏”，分别在2017中国上海国际童书展会展中心和复旦大学图书馆集体亮相。“儿童文学八骏”是本次中国上海国际童书展唯一邀请到的作家团队。福建少儿社等出版社与“八骏”签订了出版合同。

备受文坛关注的“甘肃文学八骏”，是由中国作家协会、甘肃省委宣

传部连续扶持推动，上海市委宣传部、上海市作家协会和浙江省作家协会阶段性支持实施的甘肃省政府国家级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十一个”文艺精品工程的“一支文学劲旅”。“文学八骏”三年轮换，接力奔腾。截至目前，这一历时12年的文学人才创意推介工程，已经形成了三届“小说八骏”、两届“诗歌八骏”和两届“儿童文学八骏”56人次的强大阵容，声名远播文坛内外，已成为东西部文化交流的成功范例。

(刘文)

农民诗人蔡诗国坚守诗歌创作

湖北农民蔡诗国近年来在从事农业生产的同时坚持诗歌创作，先后在《诗刊》等发表作品，并出版了《诗化梁山伯与祝英台》《诗化节义传·秦雪梅》等多部作品，被湖北省作家协会发展为会员。湖北省作家协会在诗人的家乡湖北广水市蔡河镇徐店村举办

了“农民诗人蔡诗国诗歌作品研讨会”。大家认为，蔡诗国是新时期坚守农村诗歌创作的一个优秀代表，也是地方民间文化忠实的收集者、整理者，他的诗集《广水九歌》对广水地区传唱了数百年的民间孝歌进行了收集和整理，既是对当地民间文化的一种传承，也表现出一位农民诗人的高度历史责任感。(古月)